

傅柯論權力與主體*

林淑芬

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本文以傅柯 (Michel Foucault) 對超驗主體 (transcendental subject) 的質疑，知識／權力及主體形構 (subject formation) 的交互關聯，和其所涉及的細緻的規訓 (disciplinary)、律化 (regulatory) 力量網絡的詮釋，及系譜學分析所強調的歷史脈絡及偶然性 (contingency)，提出對「國家」與「公民」的一種嘗試性的解讀方式。亦即以「權力關係」取代「國家」、以「主體」置換對於「公民」的討論，並勾勒出系譜政治想像的輪廓。本文最後則針對前述系譜政治所隱藏的「去政治化」等問題提出補充說明。

關鍵詞：主體、權力、現代性、抵抗、政治

* 本文初稿在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於 2001 年 11 月 28, 29 日舉辦之「公民與國家」學術研討會發表，感謝論文評論人蘇峯山教授的評論，以及論文審查過程中兩位匿名評審寶貴的建議。

收稿日期：91 年 3 月 7 日；接受刊登日期：92 年 4 月 18 日

他們無法忍受（而這令人不得不同情）聽到有人說：「論述不是生命：它的光陰不是你的；在之中，你無法與死亡和解；你極有可能已經在你所說的話語力量下弑殺了上帝；但是千萬別以為你可以從你所說的話語中創造出一個比祂更長壽的人。」

——Michel Foucault 1989a: 211¹

壹、前言

本文以傅柯 (Michel Foucault) 對超驗主體 (transcendental subject) 的質疑，知識／權力及主體形構 (subject formation) 的交互關聯，和其所涉及的細緻的規訓 (disciplinary)、律化 (regulatory) 力量網絡的詮釋，及系譜學分析所強調的歷史脈絡及偶然性 (contingency)，提出對「國家」與「公民」的一種嘗試性的解讀方式。亦即以「權力關係」取代「國家」、以「主體」置換對於「公民」的討論，並勾勒出系譜政治想像的輪廓。本文最後則針對前述系譜政治所隱藏的「去政治化」等相關問題提出初步反省。

貳、「人」與現代情境

如果，生命只會發生一次，生命是因而顯得輕盈，或益發沉重？如果，沉重在其為負擔及對人的自由產生限制的同時，使人因貼近地面而感到踏實；而看似了無牽掛的輕盈，使人飄飄然無所適從，那麼究竟是輕盈或沉重使人難以承受 (Kundera 1984)？如果，一如鄂蘭 (Hannah Arendt) 所言，在現代中，思考已如上一個沒有扶手的階梯，失去了足以為憑藉的一套價值標準 (Arendt 1979)，那麼，我們是否因此具備了完整的自主性，或者，自此將惶惶終日顧盼不前？如果，一如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所宣稱的，「上帝已死」，人是因此得到徹底的解放，一切皆被允許 (Nietzsche 1974; Kólakowski 1982)，或者其實我們被迫面對另一個宿命：人必須將責任一

1 本文中所有的中譯，除非特別標明，皆為筆者自譯。

肩挑起，且永無卸下的可能？亦即當基督宗教中上帝原先所佔領的超感性世界的位置空出，人們是否被要求重新佔領那個超感性的理想領域（Nietzsche 1968；海德格 1994: 209）？²

針對「人」在現代中誕生的脈絡，及現代性的諸多弔詭及兩難的困境——樂觀充滿希望的同時，卻又陷入一種永無止境的不確定感及焦慮恐懼；城市漫遊者（*flâneur*）看似隨遇而安四海為家的晃蕩中，似又時時為鄉愁所苦，渴望建立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歸鄉（homecoming）的想望？³——傅柯延續了尼采的問題意識，⁴在《事物的秩序》⁵中提出了他的解讀。而此一解讀是藉由突顯人文／本主義（humanism）建立在以人為核心基礎的知識論述困境來解構現代「主體」。⁶傅柯認為人文／本主義雖然是歐洲社會中一組重複出現的主題，但其內容持續不斷地更新。到了十九世紀，人文主義與科學知識結合在一起（1984: 44），而這樣一種新的接合（articulation）⁷並非由一個單一事件或各自獨立的論述所啟動。事實上，它象徵的是一種知識論述體系的根本轉變。

2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對尼采而言，上帝之死代表的是對於過往最高價值的否定，但隨之而來的是新的價值體系的建立，而此一新價值體系的確立恰恰便是建立在對於過往價值的廢黜、重估、與對於價值的重新設定之上。請參閱尼采在《強力意志》一書中關於虛無主義的分析（Nietzsche 1968）以及關於海德格關於尼采論虛無主義的討論（海德格，1994）。

3 這就是康諾里（William E. Connolly）所稱的鄉愁（homesickness），康諾里認為人在弑殺了上帝之後，產生了更濃烈的鄉愁，而現代的思想家不斷嘗試為鄉愁尋找藥方，比如說早期現代的思想家會以理性、精神、主體等來取代上帝。（Connolly 1988: 137）。

4 我們可以說鄂蘭對於在政治上尋求一個先驗基礎的質疑，以及對於所謂價值中立的批判，呼應了尼采反基礎主義（anti-foundationalism）的思考。請參閱（Arendt 1977; Dana R. Villa 1999: 107-27）的相關討論。

5 《事物的秩序》乃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77) 的英譯本標題，法文標題的中文直譯應為《辭與物》，目前已有的中文譯本為《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莫偉民譯，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但因本文所參考是英譯本，因此採用《事物的秩序》為該書譯名。

6 這種以人為核心的思考方式傅柯稱之為「人類中心」（anthropologism）。

7 此處所用的「接合」是拉克勞（Ernesto Laclau）及慕芙（Chantal Mouffe）所發展出來的論述理論的重要概念，簡而言之，此一概念強調的是，在不具有內在或本質上的關聯的事物或概念之間，製造連結以成就一個意義指涉的體系，（Laclau & Mouffe 1985: 105-114）。

一、人及其化身 (Man and His Doubles)⁸

首先，根據傅柯的觀察，古典時代（十七、十八世紀）與現代⁹的分水嶺，不在於試圖運用客觀的方法來研究「人」，而在於賦予了「人」經驗及超驗 (the empirical and the transcendental) 主體的雙重身分。人在現代中一方面成爲被觀察、凝視、研究的知識對象，另一方面則扮演了觀察者與研究者的知識主體角色 (ibid.: 312)。隨著那些將人對象化的知識，包括生物學、經濟學及語言學的發展，人作爲一種有限的存有，被各種不同因素所限制決定，似乎成了一個不爭的事實：人對自身有限性的理解便有如我們了解「腦的解剖結構，生產成本機制，或是某個印歐語系語言的動辭變化」(ibid.: 314) 一般自然。然而當在現代的知識論述體系中人的有限性成了客觀的知識，且人又同時經歷主體化及對象化的過程，我們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如果在強調知識的科學實證性的現代，知識的建立依賴人的實際經驗，而人的實際經驗卻被歷史、文化、身體所銘刻和侷限，那麼人如何取代象徵全知全能的上帝或君王？其次，扮演知識主體的先決條件為何？是否知識論述的可能性條件一定得是具有普遍性的觀念或範疇，而所謂的「超驗」必然和「歷史性」及「有限性」互斥？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在傅柯關於知識的討論中看見康德 (Immanuel

8 關於 'double' 的翻譯，本文參考的是林志明在《古典時代瘋狂史》的譯者導讀。林志明指出 double 在法文中有雙重意義：「除了一個和真身 (original) 相似甚至完全相似卻又不同的反影式化身之外，還有雙重、分裂等意義」(林志明 1998: v)。

9 在此必須指出的是，鄂蘭區分「現代時期」(modern age) 以及「現代世界」(modern world)。她指出就科學而言，現代時期的起點是十七世紀然後終止於二十世紀初期；而政治上的現代世界也就是我們生存的當下是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那一刻開始，請參見 (Arendt 1958: 6) 及 Arendt (1977: 27)。基本上，關於「現代」在時間上的指涉說法一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比方說，當我們把馬基維利視爲現代政治思想的奠基者時，「現代」所指涉的便是西方的中古時期之後文藝復興時期及早期現代開始。然而，傅柯將十七、十八世紀稱爲「古典時代」，他所謂的現代是更晚的十八世紀末期以降。即使如此，如果我們著重的不是歷史的分期，而更是傅柯所指稱的 'episteme' 的轉換，那麼，這些不同的說法中，其實有一個共通點，那便是：現代性和「人」的出現及其主體性的確立密不可分。布魯門布爾格 (Hans Blumenburg) 在其討論現代性的重要著作中也指出尋找所謂「現代」的時間起點並不重要，重點是確定現代的特徵 (1983)。

Kant) 的身影。兩者關心的其實都是人類知識的本質、可能性條件、及其限制的問題。即使如此，傅柯與康德之間存在著相當根本的歧異。首先，如果康德所提出的作為人類知識可能性條件（同時也是限制）¹⁰ 的概念範疇，所強調的是普遍性及必要性；那麼傅柯強調的則是知識的存在條件以及限制仍是歷史的，且具有變動、不連續的特質。對考古學時期的傅柯而言，知識可能性條件的變動便是所謂的「知識結構」(episteme) 或「論述場域」(discursive field) 的轉變 (1989a: part IV, chapter 5)。¹¹ 我們可以說，傅柯的知識結構具備了「準超驗」(quasi-transcendental) 位階——如果我們想要避免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的限制，提出超驗問題顯然是必要的，但傅柯的進路顯然與超驗哲學傳統的康德及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不同。其次，傅柯認為現代所面臨的課題不再是經驗如何可以形成「判斷」，而是人如何去思考及看待他所未思考的。依照傅柯的詮釋，此一現代的課題並沒有辦法擺脫「我思」(cogito) 這個主題。換言之，前述的種種關於人的有限性、主體與對象之雙重性，及其與知識的互生互動關聯等等問題的釐清，都必須進一步扣緊傅柯對笛卡爾 (René Descartes) 「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的反省。

在傅柯的理解中，「我思故我在」——以思考（懷疑）證成存有的思辯方式——在現代中處處顯得捉襟見肘。傅柯強調現代的「我思」和《沉思錄》中的「我思」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是不同的。對笛卡爾而言，「思考」可以用來解釋我們的錯誤、幻象，而進一步破除這些錯誤和幻象，並藉此確定自我作為一種獨立於外在感性世界的思考存有 (thinking being)。相對於此，傅柯認為現代中的「我思」忽略了思考事實上是建立在「未思」(unthought)

10 對於康德的知識的「可能性條件的探討」以及「條件」所指涉的意義，亞歷森 (Henry E. Allison) 指出所謂的知識的可能性條件，(亞歷森自創 'epistemic condition' 一詞) 所指的乃是使對象或某一客觀情境能夠再現之必要條件；我們必須將其與強調使思考具一致性之「思考的邏輯條件」(logical condition of thought) 區分開來，(1983: 10)。

11 關於傅柯放棄「知識結構」這個結構主義式的用詞以及其對考古學的修正，詳見下節。

的基礎之上 (ibid.: 324)。¹² 如果在重視知識經驗性的現代，¹³ 知識的經驗內容同時是知識的基礎，知識在特定歷史節點的侷限性便會使「人」和所謂的「我思」之間的聯結不復澄澈透明。此乃因為在現代中，我們必須不斷地面對一個艱困的課題：如何為那些未能帶領人朝向自我意識 (self-consciousness) 的事物之存有定位？或者，人應該如何看待那個因著人的有限性而尚未被人的知識所理解及歸納分類的世界？這些問題促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索「我思」和人的存有之間的關係。傅柯指出，在現代中，人作為一種存有模態 (mode of being) 基本上是開放的。人總是試著從自己尚未被「我思」觸及的部分延伸並展開思考的行動，藉此試探跨足未知的領域 (ibid.: 322)。因此，笛卡爾試圖在「我思」與存有之間建立的通暢管道及一種具確定性的根據似乎便受到了「未思」橫阻與破壞：人的存有本質不能被化約或等同為「我思」，因為「我思」永遠總是有限的、暫時的樣貌之呈現。

至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傅柯認為人和「未思」之間一如孿生兄弟的不可分割。「未思」以一種人的「它者」之姿存在：作為一個它者，它不可能內在於人，但它卻像幽靈一般和人如影隨形。傅柯強調，從現代的知識結構出發，重要的不是如何在倫理、政治、或人文／本的形式上為「西方」的命運負責，或是在歷史裡展現科層理性的意識。相反的，現代知識結構的核心關懷是思考如何可以是知識的起點，且同時具有修正、轉化、反省其所知及探測其所不知的能力。然而吊詭的是，思考永遠無法真正地發現或理解「未思」，因為一旦思考嘗試接近「未思」，不是將「未思」轉化成為思考的一部分，便是將其排擠。而不論是同化或排擠，都將使人對自我存有的界定上發生本質上的變化 (ibid.: 327)。換言之，「未思」吊詭地成為現代思考以及人不斷增進對自我的認識及掌握的可能性條件。也就是在我思和存有之間有一個不可

12 我們可以說「未思」具有「不假思索」及「不可思議」兩個特質：傳統對於我們的意義似乎便在提供我們一個「不假思索」的意義實踐場域，並對於尚屬「不可思議」的空間進行排除或區分。傅柯在此雖然並未引用海德格，但是與海德格的 *Destruktion* 十分相近。在這個意義上，德悉達的解構所欲達成的目的亦在於對於「未思」的質疑探究。

13 傅柯指出自康德以降，哲學的角色乃在防止理性超越經驗的界限 (1982: 210)。

或缺的「構成性外在」(constitutive outside)¹⁴——「未思」。

傅柯所提示的現代性的第三個困境是關於源頭 (origin) 的追尋。對現代而言，源頭已不再能被想像理解。因為不論是人的勞動、生命、語言等等的知識都具有歷史性，它們不可能呈現出自己的源頭。用傅柯的話來說，不再是源頭造就了歷史性，相反的，是歷史性使源頭必須吊詭地既內在又外在於歷史性。¹⁵ 自十九世紀以來，人和所謂的源頭產生了一種新的關聯，也就是人和源頭不可能同時存在。當人試著去界定自己或找出自己的開端 (beginning) 時，只能在已經被制度化、從屬於社會的人類時間及空間中達成。比方說，如果人試圖為自己作為一個言說主體 (speaking subject) 的本質定位時，當他一開口，很快地就會發現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建立在先前已經奠定基礎的語言之上 (Foucault 1994: 330)。換言之，對人而言，所謂的源頭都不會是真正的源頭，沒有什麼是真正從零開始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已然開始 (already begun)。¹⁶ 在這層意義上，我們可以宣稱人和事物不同，人是沒有源頭的。當人不斷試著找尋回歸源頭的同時，源頭便不斷地倒退逃逸，一如消失的地平線 (ibid.: 332)。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傅柯對於西方現代性中的「人」、「存有」及「知識的可能性條件」等等範疇的建構之批判與反省。但是我們會面臨兩種迥然不同的質疑。第一種質疑強調的是即使我們接受傅柯對於西方「現代性」的理解，「西方」難道不是已處於一個「後現代境況」中，其中，後設論述正當性漸次減弱，取而代之的是各種零碎、片段的小論述與在地論述？而當「作者已死」、「去中心」、「去疆域」、「逃逸」等論調已成為時髦的文化語彙，那些屬於現代的問題及困境是否仍舊對我們構成威脅？然而，將諸多自不同角度批評現代性及啓蒙論述的作者統稱為「後現代主義者」並不十分精確。不

14 'Constitutive outside' 一詞乃出自史岱騰 (Henry Staten)。史岱騰認為德悉達 (Jacques Derrida) 顛覆了西方形上二元對立的傳統，指出比如本質的 (essential) 及意外的 (accidental) 兩個看似對立截然二分的概念之間其實相互滲透，彼此需要。

15 這種既內又外的特性和德悉達關於「中心」的曖昧性相呼應，請參見 (Derrida 1978)。

16 此處我們不難聯想到德悉達的慣用語 (always already)。雖然傅柯的書寫和德悉達對於西方形上學的解構採取非常不同的路徑，但是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同於宣稱我們已處於後現代社會的作者，許多對現代性持批判態度的作者並不認同所謂的「後現代主義」，遑論何謂「後現代主義」仍是莫衷一是，各執一詞。如果我們非得要用「後現代」一詞來理解傅柯對於現代性的批判，那麼「後現代」絕不是揭橥一個新的時代的到臨，其代表的毋寧是對現代性的詮釋及介入的方式，我們甚至可以說，不論是「前現代」或「後現代」都只是「現代」的建構及其化身。傅柯就曾指出，與其談「前現代」及「後現代」，還不如談現代性與反現代性（counter-modernity）之間的糾纏爭鬥（1984a: 39）。

第二種類型的質疑，除了針對傅柯對於現代的描述之批判性，也集中在將「後現代」解讀成一種標示著與現代性的根本斷裂，認為「後現代主義」企圖將現代中的理性主義、普遍主義以非理性主義、相對主義取而代之；「後現代」因此被視為一種與真假無涉的論述遊戲。比方常見的對於同樣被劃歸為後現代陣營的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批評便是認為其理論只有解構「去中心」，在其理論中找不到政治的可能或行動的基礎。綜觀這些批評，我們不難發現這一類型的質疑背後有一組更關鍵的問題：是否提出人失去思考及行動的最後憑藉時，就一定會成為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眼中徹底拒絕現代性、反啓蒙，在政治上極其可疑的新保守主義者？¹⁷ 傅柯對於現代性的「詮釋」究竟要把我們帶往何方？是否一如芙瑞瑟（Nancy Fraser）提出的質疑：傅柯對現代社會的問題沒有批判的立場或依據，因此他迫切需要的是一個規範性範疇作為其批判的起點（Fraser 1989: 33）？

如果相對主義與虛無主義是現代揮之不去的陰影，那麼這些陰影是否可以對我們關於政治的想像產生正面積極的意義？再者，在這樣一種思考進路中，政治行動的依據為何，何處是批判的起點？如果我們同意傅柯在〈何謂啓蒙〉一文中所強調的：我們應該避免把啓蒙和人文／本主義混為一談，所謂的啓蒙精神是對我們所處的歷史情境的持續批判，及自我的不斷創造及超

17 哈伯瑪斯批評傅柯為「年輕的保守主義者」乃相對於威瑪時期的一群包括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榮格（Ernst Junger）、史密特（Carl Schmitt）及符萊亞（Hans Freyer）的反現代主義者（1981: 3-14）。傅柯與哈伯瑪斯的辯論，請參見（Kelly 1994）。

越 (Foucault 1984: 43-45)，那麼，什麼會是一個從當下的關懷出發的政治批判？上述傅柯對現代困境的「描述」是否足以作為批判的起點？有無思考政治主體的可能性？傅柯所討論的這些關於現代的困境，其實也就是人在現代中成為主體的過程中所涉及的種種弔詭情境。而在突顯這些弔詭情境的同時，人作為一種超驗主體的地位也面臨了嚴重的挑戰。這個挑戰不僅只是針對人作為知識論上超驗主體的挑戰，它根本地開啓一種對於人成為主體——不論是知識主體、法律主體、政治主體、權利主體、性實踐的主體、或倫理主體——的過程及機制的重新反省。亦即，我們不再像近代自然法傳統中，預設「人」在倫理或法律上的無上性，並以之為基礎，探索人與社會或國家的關聯，尤其是對於「權利」的重視。例如，契約論者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對於人的自然權利的預設，而建構了政治主體。¹⁸ 反之，我們必須將焦點轉移聚集在主體形構過程上。而在討論主體形構的問題之前，我們必須較有系統地釐清傅柯的書寫及理論進路。

二、化身考古學家的困境

在前述的討論中，傅柯在《事物的秩序》的中解析了現代中「人及其化身」，即人存有的雙重性（經驗／超驗；「我思」／「未思」；源頭的回歸／無限倒退）。而這個雙重性的呈現同時揭露了將人建構為主體並將其無限上綱所引發的種種困境及弔詭。傅柯的目的既不在證成「人文科學」的科學性，也絕非將「人文科學」視為一種假科學 (pseudo-scientific) 或意識型態假象；傅柯試圖勾勒出的是現代的知識結構即「人文科學」存在的可能性條件。傅柯這種詮釋現代的知識論述體系運用的方法在他的《知識考古學》中有更系統性的呈現。傅柯定義考古學為：

一考古學並不試圖為隱藏在論述中的思想、重現、圖像、主題、成見定義；考古學試圖定義的是作為實踐並遵守某些特定規則的論

18 在此，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有學者指出霍布斯與其後的自然法論述有一個相當根本的差距：霍布斯將自然法及自然權利區分開來 (d'Entreves 1951: 57-8)。

述本身；

- 考古學並不尋找論述的連續性，而是界定論述的獨特性；及其所依循的規則之不可化約性；
- 考古學並不在所謂全集 (œuvre)¹⁹ 範疇中操作；對考古學而言，所謂的全集並不是一個有用的分類標準；
- 考古學並不在儲存人們表達在論述中的思想、希望、目的、經驗或慾望；考古學就是一個重新的書寫 (rewriting)，不是一個回歸源頭的嚐試，它是一個論述對象的系統性描述 (Foucault 1989a: 138-40)。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傅柯試圖以考古學作為對現代知識論述的一個有力的介入，尤其為了避免重蹈自己在《事物的秩序》中所揭示的現代性困境之覆轍，他明確地將考古學定位為一種重新的書寫 (rewriting)，而非對於真理或意義的追尋確認。然而傅柯一九六零年代書寫的作品中充滿了理論內在的矛盾與困境。一些研究傅柯的學者，紛紛指出考古學在方法論上的失敗 (Dreyfus & Rabinow 1982; Visker 1995)。比如說，德瑞佛斯 (Hubert Dreyfus) 及瑞比諾 (Paul Rabinow) 在他們那本引介傅柯的重要著作中指出，傅柯雖然宣示考古學的目的在於將我們從一種「超驗的自我耽溺」 (transcendental narcissism) 中釋放出來 (Foucault 1989a: 203)，但基本上傅柯既未能將自己侷限在一種「謹慎的經驗主義」 (modest empiricism) 也沒有保持一種現象學式自真理及意義中的抽離，他的考古學方法在描述性及規範性之間擺盪踟躕不安 (Dreyfus & Rabinow *ibid.*: 84)。德瑞佛斯及瑞比諾則提出一個更關鍵問題：傅柯作為一個考古學家，如何看待自己的觀察

19 「全集」 (œuvre) 簡單地說便是一個作者的「所有作品」，如「莎士比亞全集」或「馬克思全集」。這當然涉及如何界定與確認某些文本是某位作者的作品問題，包括我們是否該將同一作者以筆名發表的文章、未完成或未在生前發表的手稿及筆記收入全集中？更重要的是，全集的確認是傳統研究觀念史、思想史、或科學史等的標準研究方法之一，企圖藉由這種方式而找出一連串紛陳雜沓的事件之間發展變遷之組織原則或共同起源。但傅柯認為這種做法並不恰當。一旦我們進一步探究，我們將發現同一位作者創造的文本並不保證或代表任何論述上的一致性 (Foucault: 1989a: 23-24)。

及發言位置，以及定位他所「發現」的論述規則 (ibid.: 79-103)。意識到自己身陷考古學的種種問題而難以自拔之後，在其七零年代之後的作品傅柯以承自尼采的系譜學補正考古學，試圖帶出考古學方法忽略的兩個關鍵面向：權力關係與主體形構。

三、系譜學

在《道德系譜學》一書中，尼采明言：

……事物根源的成因和其最終的用途，以及其之於一個目的系統的效用與位置，乃不斷地被某些凌駕其上的力量詮釋成新的標的，並且收編、改造及重新導向……所有在有機世界中的事件都是壓制、成為征服者 (becoming master) [的事件]，而所有的壓制、成為征服者都涉及嶄新的詮釋以及適應，並藉由新的詮釋及適應使先前的「意義」與「目的」無可避免地模糊或甚至銷聲匿跡 (Nietzsche 1989: 77)。

在該書的〈序言〉中，尼采即賦予了系譜學一個譯解 (decipher) 的功能，藉由探究已被自然化及普遍化的道德價值 (或偏見) 建立的可能性條件、發展及演進轉變，對其提出質疑批判，使得我們一向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善惡之分以及固守的道德法則顯露出其原初的暴力面目。尼采指出系譜學乃「帶著新的問題，且彷彿是以新的一雙眼睛，詳細考察這個龐大的、遙遠的、且隱藏地如此之好的道德之地」 (ibid. 21)，而最終的「歡娛」 (cheerfulness) 則是這樣一個「長期、勇敢、不孜不倦、隱秘的認真」批判工作的果實 (ibid.)。布朗 (Wendy Brown) 曾指出尼采的系譜學涉及了三個反轉策略 (strategy of reversal)。首先，尼采挑戰日常生活中看似不可挑戰的價值體系——反轉既與性 (givenness)；其次，系譜學的反轉不只是質問，同時也作為對於這類質問的假設性回應；最後，系譜學作為歷史進程的逆轉，即挑戰所謂人類的進步 (Brown 2001: 98)。我們可以在傅柯的〈尼采、系譜學、歷史〉中看見尼采系譜學這三個層次的反轉對於傅柯的深遠啟發。傅柯闡述系譜學的目的：

系譜學家需要歷史來掃除源頭的虛幻，一如虔誠的哲學家需要醫師為他驅散其靈魂之陰影（1984b: 80）。

歷史將不連續性引進我們的存在時，便變得「有效」（effective）——當它離開我們的情緒、戲劇化我們的直覺，多重化我們的身體並使之與自己對抗。「有效的」歷史剝奪自我明確穩定的生命與自然，它也不會准許自己被朝向千禧終點之沉默無聲的頑固傳送（ibid: 88）。

我們必須深掘並揭露事物乃歷史的偶然，是因為某些理由而被理解認知，而非一種必然。我們必須使這些可被理解的事物在一空盪的背景中現形，從而否定其必然性；我們必須認知到已存在的事物並不填滿所有可能的空間（1989b: 208）。

在傅柯的區分裡，系譜學家重視的開端（beginning）是一個充斥著意外、斷裂不連續、衝突、危險、以及變數的領域；反之，傳統史學家所關注的根源（origin）強調的則是一個純粹的、遙遠的源頭。針對考古學的定位不清的問題，傅柯清楚地宣示系譜學的批判立場。他指出系譜式思考並不是在尋找根源，而是在「挖掘伴隨著所有開端的細節及意外」（1984b: 80）；「系譜學應被視為一種將歷史自從屬狀態中解放出來，並使其具有反對及抗拒理論性的，一元的，形式的，科學的論述嚐試」（ibid: 83）。不同於考古學作為一種分析「在地論述性」（local discursivity）的方法，系譜學對傅柯而言所扮演的是一種策略（tactics）的角色，並藉此釋放描述在地論述性的從屬性知識²⁰」（ibid.: 85），同時也呈現存有的不連續性及起伏（ibid.: 88）。

20 從屬性知識（subjected/subjugated knowledges）指的是被掩蓋埋藏的歷史內容，以及那些被視為不符合標準的、不恰當的知識，及在所謂的「科學性」層級上較低的知識（Foucault, 1980b: 82）。傅柯在一九七六法蘭西學院的講課中則更清楚地指出系譜學是「博學知識」與「局部記憶」之間的連接，其目的在於「使那些局部的、不連貫的、被貶低的、不合法的知識運轉起來，來反對整體理論的法庭，後者以真理認識的名義，以控制在幾個人手裡的科學權利的名義把那些之事都過濾掉了，對他們進行分級、整理」。系譜學「不要求一種對於無知或非知識的抒情的權利，它也不是拒絕知識或運用和說明尚未被知識捕獲的即刻經驗的魅力。它並不指這些，而是指知識的造反。」（傅柯，1999: 8）。

值得注意的是，文蒂·布朗（Wendy Brown）指出傅柯與尼采的系譜學之間存在著重要差距，包括對於「慾望」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的看待方式。布朗認為尼采有過分心理化欲望的傾向，然而對傅柯而言，並不是慾望中的權力意志，而是更廣義的權力本身在推動歷史、轉化主體；並不是欲望或理念，而是社會權力及知識構成了系譜學的探索（Brown *ibid.*: 99）。因此，我們可以說是權力而不是欲望才是傅柯所關注的。但什麼是傅柯念茲在茲的權力呢？我們可以清楚看見，系譜學時期的傅柯將研究重心轉移到各種不同的制度所涉及的宰制與權力關係的運作上，而也就是在這個時期的作品中，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傅柯如何突破政治哲學研究「國家」與「公民」的傳統提問方式。

參、權力關係與主體形構

一、規訓(discipline)與統管理性(Governmental Rationality)²¹

傅柯自稱其自一九六零年代以來的書寫所關注的既不是權力現象的分析，也不在闡述這樣一種分析的基礎，而毋寧是在創造一個不一樣的歷史，並藉以檢視在西方文化脈絡中「人」如何成為主體。傅柯歸納出其研究人形成主體所涉及的三種不同形式的對象化／客觀化(objectification)：某些學科「科學」地位的確立，比方說一般文法學(*grammaire générale*)、語音學、語言學等將人客觀化為說話主體；在分析財富及經濟時將人客觀化為勞動主體；或是將人視為一種自然歷史或生物學中的存在；²²藉由「區分實踐」(dividing practices)來客觀化／對象化主體；以及人創造自己成為主體(1982: 208)。雖然傅柯堅持貫穿其研究的主題是「主體」而非「權力」²³(*ibid.*:

21 傅柯一九七八年在法蘭西學院的年度課程原命名為「安全，疆域，及人口」，但傅柯隨後將其改為「統管理性」。所謂的統管理性便是在這一系列的演講及當時參與討論課程的一些學者發展出來的。

22 這一部分的研究正是《辭與物》的主題。

23 在另外一個訪問中，傅柯則清楚點出他在《古典時代瘋狂史》及《診所的誕生》中談的就是權力的問題(1980c: 115)。

209)，事實上，在其作品中，主體的研究與知識／權力一直是相互交疊，密不可分。尤其我們可以藉由傅柯一九七零年代以降的作品勾勒出的主體／知識／權力的不同面向，進一步掌握權力的意涵。

首先，在《規訓與懲罰》中傅柯描述了經過人文主義改革之後的現代監獄如何透過繁複綿密的時間空間細節之安排，²⁴ 啟動一連串監督凝視的機制，將囚犯個別化 (individuation) 及對象化，並使其再次成爲法律主體。這些矯正及正常化的機制主要是透過身體進行的。在監獄中，囚犯的身體一方面被改造成爲馴化的身體 (docile bodies)，另一方面則成爲符合資本主義生產及資本累積之「有用的」，即具有生產能力的身體 (Foucault 1991a)。在這個研究中，傅柯不但描述了規訓與懲罰的演變過程及規則的產生，但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系譜學的研究不再只是將權力關係化約爲一種壓迫關係。反之，它突顯了權力關係作爲一種複雜的機制，所可能具有的生產性，以及伴隨著新的權力技術演變，關於人的知識所產生的變化。簡言之，傅柯關於懲罰制度演變的系譜學研究，所關注的是施展於身體的政治技術與人的對象化過程之歷史，而這個歷史亦可被解讀成是「權力關係及對象關係的通史」(1991a: 23-2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在被對象化的過程也同時被建構成主體，這種主體化及對象化的同時性乃是貫穿傅柯關於權力關係與主體形構的研究主軸。

其次，傅柯認爲不論是自由主義傳統或馬克思主義傳統都視國家爲一個單一實體，或將國家化約爲維續生產力的發展或生產關係的再生產等等功能，致使國家無可避免地成爲須被攻擊或佔領的場域。但是傅柯強調現代國家已不再具備這種一致性或總攬執行所有功能的重要性，這種對於國家的理解充其量不過賦予國家一個類似神話的地位。傅柯認爲自十八世紀以來，國家已經進入了另一個階段，以傅柯的術語來說便是國家的「統管化」(governmentalization) (1991b: 103)。這意味著不是「規訓社會」取代「主權社會」，「統管社會」取代了「規訓社會」，而毋寧是一種並存的三角關係。傅柯提出以「統管理性」(governmentality; governmental rationality) 或國家理性

24 傅柯說「規訓是細節的政治解剖學」(Foucault 1991: 139)。

(*raison d'état*) 取代傳統（不論是自由主義傳統或是馬克思主義傳統）將國家當成一個單一實體及工具化國家的傾向。

傅柯指出自十六世紀早期現代始，「統管」(government) 漸漸成爲一個重要且層次豐富的領域。它包含了對於自我、靈魂、生命／生活、兒童及教材等等的統管，而君王對於國家的統管只是其中一項。換言之，在十六世紀封建制度漸次瓦解，並朝向廣袤疆域的行政殖民國家開展的十字路口上，「如何管理自己，如何被管理，如何管理他人，人們會同意讓誰管理，如何成爲最佳的管理者」等問題似乎才是最核心的 (1991b: 87-8)。在這個脈絡中，傅柯認爲馬基維利《君王論》著重的是君王相對於統治的王國所具備的獨一性 (singularity)、外在性 (exteriority) 以及超越性 (transcendence)。權力使用的目的在於：

強化及保衛王國，但是王國指的並不是屬民／主體 (subject) 與疆域之間所形成的客觀整體，而是君王與其所擁有的 [一切] 之間的關係：它所繼承或掠奪的領土及他的屬民 (ibid: 90)。

雖然自十六世紀以降，馬基維利的著作便與「國家理性」(*raison d'état*) 等同並置，但是傅柯認爲我們不應混淆馬基維利與國家理性的關聯。他指出馬基維利是文藝復興時期政治理性的思想代表，與前代的政治思想的斷裂在不以形上或倫理的「善」作爲政治生活的終極目標——其追求的毋寧是君王的權力本身。但是所謂的國家理性並不在追求君王本身權力的擴充及鞏固，而是將國家視爲目的本身。易言之，國家不但從倫理關懷中釋放出來，也不再與統治者的權力發生必然的關聯。傅柯認爲與馬基維利同時期的拉皮耶爾 (Guillaume de La Perrière) 所著作的《政治之鏡》才是國家理性這種新統治技術的代表。

首先，拉皮耶爾所謂的統管技術不再集中在獨一超越的君王，而統管對象範圍更是包羅萬象，而非傳統狹義的君王及其國家的關係。這在勒維耶 (Le Vayer) 的討論中得到呼應。勒維耶認爲統管可以分成三個方面：自我管理——與道德相關：家庭管理——與經濟相關；國家管理——與政治相關。而

這三個領域之間具有連續性 (ibid: 91)。一方面，一個統管者必須先能妥善管理自己始能管理他人、國家；另一方面，當一國家管理完善時，家戶長便會知道如何照顧自己的家庭、財產等等，而個人也會因此行止得宜。其次，傅柯指出拉皮耶爾已經清楚意識到統管的對象不是疆域，而是人與事務組合而成的複合體，及人與其他事務——包括天候、土質、灌溉、習俗、飢荒、傳染病、死亡——之間的種種關係與連結 (ibid: 93)。傅柯認為藉由拉皮耶爾的書寫，我們可以清楚得知「統管被界定為事物的正確安排」，且其所追求的不是共善，而是事務的方便管理。統管的工具不再是法律，而是多樣的策略 (tactics) (ibid: 95)。

十六世紀末期至十七世紀初期的發展則更突顯「國家理性」——作為一種正面意義的國家理性，不是從神的律法、自然法或智慧道德中衍生出來，而是國家自身便具有理性，「重商主義」(mercantilism)²⁵ 乃是這個典範的代表。自十七世紀以來，政治哲學逐漸從與神學的結合中解放出來，而在這個漸進的世俗化過程中，西方政治哲學對於權力的研究焦點也漸漸轉移到主權及國家之上。十七世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霍布斯 (Thomas Hobbes) 的權力觀便與主權概念密不可分。在一個「主權」及「民族國家」典範尚在起步階段的十七世紀，霍布斯在《巨靈》(Leviathan) 中所欲完成的便是單一意志的粹煉，即在眾多個體之間建構一個展現主權精神獨一無二的「政體」(body politic) (Foucault 1980b: 97)。在《巨靈》裡我們看見的是一個高高在上、全知的立法者，俯視著生活在權威秩序中的子民。在霍布斯的政體中，關鍵的乃是個體行動必須得到主權者的「授權」或「同意」，並在這個過程中，確定個體遵從順應了主權者的意志。雖然霍布斯強調「人並非天生與社會契合，而是透過規訓」(轉引自 Gordon 1991: 14)，²⁶ 但是霍布斯所謂的規訓卻與傅柯有著相當大的差距。霍布斯的確嘗試找出統管技藝 (art of government) 的原則，但是仍將範圍侷限在公法的一般原則上，使得主權概念往往流於

25 傅柯指出重商主義的問題也就在於將重心擺在主權者身上，並使用了典型主權者的手段：法律、命令及規定 (ibid: 98)。

26 原文出自 Hobbes, *De Cive* 1.1。

「太龐大、太抽象、太僵化」，同時又依賴了一個過分單薄脆弱的、以家庭為基礎的經濟生產模式 (Foucault 1991b: 98)。而隨著幅員愈益擴大，經濟富足，農業生產的提昇，人口成為問題，造成統管的知識與人口密不可分，人口成為統管的最終目的，而統管的藝術也得以發展，並漸漸轉變成政治經濟學、政治科學 (ibid: 99-100)。傅柯強調這個轉變意味著主權問題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更形重要。在統管技藝存在與普及的脈絡下，主權問題涉及的是探究「何種法律與制度形式，法律何種基礎可以給予以主權為特性的國家」(ibid: 101)。²⁷ 一如傅柯所言：

主權、法律、以及禁令形塑了一個權力再現體系，而其後的權利時代則進一步延伸此一體系：政治理論從未停止對於主權者 (the person of the sovereign) 的迷戀。直至今日，這些理論仍奔波忙碌於主權問題。然而，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種既非繞著主權問題，亦非繞著法律禁令打轉的政治哲學。我們必須割斷國王的首級：而在政治理論中，這是尚待完成的 (Foucault 1980c: 121)。

然而，所謂的統管權力不止包含人與人之間的統管，也包含了人對於自我的統管。前者涉及的比較是巨觀層次的管理，而後者則是挹注在人的身體上、行動、及行為規範的「身體微觀生理學」(micro-physics of body)。傅柯認為自我統管亦可以被理解成基督教牧養權力 (pastoral power) 的現代形式。與基督宗教中牧養²⁸ 不同的是，作為現代的牧養權力的統管理性，強調的不再是到達彼世的救贖，而更是對此世的確認。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救贖也具備了不同的意涵：健康、完善的生活、安全、保障成了更重要的標的，而促成執行這些標的的國家及私人機關，包括警察、醫院等等，也因之

27 傅柯認為這個發展在盧梭 (Rousseau) 的著作中格外分明。盧梭的《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中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討論中說明「政治經濟」所指的不是傳統的家庭經濟，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統管技藝。在其後的《社會契約論》中，盧梭所探討的則是自然狀態、契約、全意志等概念以賦予主權一個法律原則，並藉以定位統管藝術 (1991b: 101)。

28 「牧養」乃出自於聖經〈詩篇〉第二十三章：「耶和華是我牧者」。

紛紛設立。在牧養權力的目的與代理者增加的同時，我們見到人口普遍化與數量化以及個人分析化的現象。換言之，與人相關的知識的內容及取得方式不斷地演變（1982: 215），而在這個脈絡下，作為國家的主體／屬民（the subjects of the state）的個人，也不斷地被鼓勵開發虛心、慈悲、勤奮、忠心等特質。²⁹

乍看之下，傅柯對於「統管理性」的理解似與韋伯（Weber）對於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批判無異。對於韋伯而言，合理化的過程代表的並不必然就是理性（reason）的發展，更不是啓蒙精神的體現。反之，所謂的合理化導致的是控制與規約，並以創造有效率的社會組織形式為鵠的。在這種合理化的過程中，追求的並不是個人或集體道德理性的發展，反而使人身陷「工具理性」囹圄，受制於官僚科層宰制。的確，傅柯與韋伯對於合理化過程及伴隨其發展的規訓技術的批評有許多雷同之處，但是，如果我們更細心閱讀，將不難發現兩者間的差異。傅柯並不似韋伯預設了合理性是人的非變項（anthropological invariant）（Foucault 1991d: 79）。對傅柯而言，他所想要觀察的權力關係或規訓制度，並不是一個在普遍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或進程，或預設理性的價值，而更是在不同領域中各種合理性的諸多形式。更具體地說，傅柯並不認為過去斬首示眾等酷刑較之監獄制度在本質上缺乏合理性；其被視為不合理（irrational）乃是因為刑罰實踐過程已涉及一種看待其所產生之效果的新方式。傅柯認為我們並不在一種對於理性的絕對預設下進行觀察或評價，而是觀察特定合理性中的諸多實踐（ibid.）。對傅柯而言：

若欲尋求非規訓式的權力或與規訓及規訓權力抗爭，我們不該求助於古老的主權權利，而該是致力於一種新的權利形式的可能性，一種真正反規訓，但同時又可以將我們從主權原則中解放出來的權利形式（Foucault, 1980b）。

29 傅柯亦提及十八世紀德國發展出來的「警察科學」（*Polizeiwissenschaft*），基於某種國家理性及達到國家富強的目的，預設人們總是沒有足夠的注意力，秩序與行政管理永遠不足。換言之，其所鎖定的控管焦點便是與人口有關的事物（Foucault 2000c: 74）。

綜言之，在統管權力的運作中，我們看見了政治主體的誕生與形塑。對傅柯而言，「主體」此一概念本身有兩層意涵：從屬（亦即受他者控制或依賴他者）及自我認知及認同（1982: 212）。而此一自我認同的過程，便涉及到權力關係與主體的互動關聯。這樣一種對於國家的重新概念化，也暴露了傳統公民權及公民身分與民主之間的關係的討論之不足。公民權及身份的反省不應僅只是侷限在不斷擴充公民權的適用範圍或公民權的內容，或預設人作為一種權利主體的超驗性。更值得深究的是「公民」作為政治主體的形構過程及其與國家作為一種統管權力關係網絡之間的互動。這樣一種新的反省自然地影響到政治抵抗的解放的想像及策略。

對傅柯而言，一般所謂「解放」的政治想像多半預設一種人的本質，及人的本質在一種特定的歷史、經濟、社會過程被隱藏、異化、監禁或壓抑。因此只要能打破那些障礙，人便能回歸原真的到解放（*ibid.*: 282）。傅柯認為這樣的一種解放的政治觀預設了一個超驗的主體，並沒有充分掌握現代權力關係的運作與主體形構之間的關係，也因此不足以構成人的自由的實踐全貌（*ibid.*: 282-83）。如果我們說傅柯在《規訓與懲罰》及《性史》第一卷的書寫象徵著由考古學對人文科學論述實踐的研究過渡到系譜學對權力關係的彰顯；那麼，自《性史》第二卷之後的書寫則標示著傅柯的倫理轉向（*ethical turn*），將研究焦點轉移到探究自我與自我（*rapport à moi*）的關係，自我如何形成主體的過程（Foucault 1992: 6）。這個探究強調建立在自我技術自我倫理的政治觀，不同於以往將政治主體視為法律或權利主體。它將政治思考的重心轉移到在倫理主體之上（2000a: 294），透過人的不斷自我創造及修養的過程追求自由的可能。³⁰ 而這種不斷的自我修養，乃必須以對每個當下權力關係與主題形構機制的系譜式掌握及批判為起點，當我們討論國家與公

30 在這個訪問裡，傅柯對於從自我倫理的角度思考政治並未多所著墨，因其拒絕對尚未深入研究的主題發言。他只是提示性的指出，倫理主體是一個被長期忽略的面向（2000a: 294）。傅柯對於存有的反省，明顯受到海德格關於「此在」的思考的影響。對海德格而言，此在的可能性是歷史的、特定的（Heidegger, 1999: 15）。布柏（Martin Buber）及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對於海德格對於「他者」因缺乏倫理反思而可能造成的暴力之批評，亦可作為我們延伸討論傅柯關於自我、主體與他者的一個重要切入點。筆者將另文討論。

民權利的問題時亦復如是。由於傅柯關於國家的概念以及與之密不可分的權利概念及自由的實踐的討論並不直接且少有系統性的書寫，我們透過晚近受尼采、傅柯影響甚深的布朗³¹ 對於國家女性主義視「國家」、「權利」為最重要的抗爭場域的政治理論及策略的批評得到進一步的釐清，並藉此說明何謂以「權力關係」的角度理解「國家」。

二、系譜政治

有別於自由主義及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傳統，³² 布朗認為國家是規訓及律化匯集的網絡節點 (loci)，因此對於尋求國家協助抵禦訓育的女性主義理論及策略抱持著懷疑批判的態度。布朗承襲傅柯在〈兩個演講〉中所提示的觀點，認為主權 (sovereignty) 及訓化是我們所處社會的權力機制兩個絕對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同時，布朗也重新詮釋了馬克思的「論猶太問題」(Marx 1978) 中關於權利論述的批評，因而極力反對女性主義理論中「豎立起由一些繁複定義及程序所構築的一個反歷史的 (anti-historical) 法律以及實證式官僚論述 (positivist bureaucratic discourse) 的修辭網絡」的傾向 (Brown 1995: 28)。這一個去歷史、去脈絡的傾向對布朗而言是支撐女性主義援用權利論述 (rights discourse)，以及「國家女性主義」(state feminism) 要求國家干預的福利國家策略之重要理論依據。

針對這種國家女性主義的政治干預方式，布朗不僅認為質疑「當代律則、規訓、剝削、宰制等秩序」(ibid.: 98) 遠比參與制定這些秩序重要；她進一步指出前述的這些國家中心或國家導向 (state-centred or state-oriented) 的女性主義政治，乃錯誤地預設一個超驗的可以主動干涉介入政策制定過程

31 Anna Marie Smith 在她的一篇評論 Morris Kaplan 的 *Sexual Justice: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Desi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曾做過類似的分類。Smith 認為當代女性主義及酷兒政治看待「國家」的方式分別受到自由主義、尼采及傅柯的系譜學、以及後馬克思主義三個理論傳統影響而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策略。參見 *Political Theory*, vol. 27, no. 6, December 1999, 頁 873-879。

32 在此必須注意的是當代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的區別在於前者所強調的機會上的公平及福利國家往往需要國家積極的介入，所謂的平等的概念也不在消弭差異，而是建立差異的基礎上爭取平等，請參閱 (Eisenstein 1993; Evans 1995; Tong 1998)。

的完整主體 (fully constituted subject)。例如，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恩萊悉 (Barbara Ehrenreich) 及琵芬 (Frances Fox Piven) 強調福利國家對女性主義的正面影響，在於促成女人之間的團結。但是布朗對此則抱持了迥然不同的立場。她認為恩萊悉以及琵芬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立論，忽視了主體就是在爭取社會福利補助津貼的過程當中被製造及性別化 (engendered; engendered)，³³ 而使「女人」成為「國家依附者」(state client) (ibid.: 194-95)。布朗的理論核心除了在探究國家所象徵的無所不在的規約性力量，以及批判國家女性主義者毫無保留地擁抱社會福利政策，更在提醒我們過度倚賴權利論述，卻缺乏一個權利論述的系譜分析的危險。呼應馬克思在《論猶太問題》中的批判，對布朗而言，這個關於權利論述的系譜批判，其重要性在於：倘若我們無法解釋「權利」此一概念或政治語彙的接合形成 (articulation, formation) 的歷史條件，我們便無法掌握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這一個特定的歷史脈絡中，權利訴求 (rights claims) 被個體化的過程，及其被體現實踐的特定形式及侷限 (ibid.: 118)。布朗提醒我們：對於權利論述的歷史性的缺乏認知，以及將某種普世的人的本質 (universal personhood) 與權利取得聯結在一起的「政治解放」論述，極有可能只是更強化了現存的訓化規約。上述說法相當程度突顯女性主義與社會福利之間所可能產生的愛恨情仇。比方說，在婦女福利政策的制定過程當中，關於什麼是可被社會接受的「女人」、女人的身體如何作為一種被規範的場域 (例如：墮胎議題、生殖科技、代理孕母)、主流家庭意識型態以及非主流家庭中的女人，例如，單親家庭、未婚媽媽等等的關聯，都是應深刻反省的問題。

基本上，布朗所提出的關於女性主義者在尋求與國家合作，甚至要求國家給予協助的過程中所冒的強化與國家政治連結的規訓風險是值得深思的。然而，平心而論，上述布朗所指稱的風險並不足以作為反對女性主義者干預／進入國家體制的有力依據。事實上布朗所指出的國家女性主義者預設一個在介入國家政策制定的超驗主體並不能算是一個有效的批評。倘若我們循著布

33 在英文的用法中 'engender' 亦可譯成「產生」，但在布朗的討論脈絡理「產生」及「性別化」這雙重意涵是同時存在的。

朗的理論進路，我們將發現她所嚴詞批評的國家女性主義主體位置也是在干涉國家政策制定，與國家作各種不同的形式接觸時，不斷建構與重新建構形成的。換言之，所謂國家中心或國家導向的運動策略或理論，並不必然會如布朗所指稱的喪失對主體形構過程的掌握。如果我們接受傅柯將國家視為權力關係網絡，權力無所不在，我們當然不能自我設限地將抗爭的場域限定在傳統的國家政府機關中。然而，重點也許不再是一味地批評國家女性主義，而是如何拉長戰線，發展出更多樣化不易被既有體制收編的抵抗策略。在此，另一位深受傅柯影響的巴特勒（Judith Butler）對於主體與制度或者廣義的權力關係的互生關係的探討，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這樣一個思考脈絡下自由解放的可能。

巴特勒在理論上的基本關懷一直以來都集中在藉由呈顯主體形構，探究抵抗及顛覆的可能性。在《性別麻煩》一書中她強調：主體並非由規則所「決定」（determined）並藉此形成，因為意義指涉（signification）本身並不是一個奠基行為（founding act）。主體乃在這些隱而不彰卻又同時不斷自我強化的「規約過程的重複」（regulated process of repetition）中形成（Butler 1990: 145）。巴特勒套用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關於憂鬱（melancholy）³⁴的討論進一步闡明「規約過程的重複」的意義。巴特勒認為主體因為意識到自己會被懲罰或因違規弔詭地喪失自己存在的可能性條件而有一種重複實踐且是以一種正確的方式重複實踐規範的強迫性行為傾向（1997: 28-29），而這也正是巴特勒所稱的展演的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換言之，現存的社會規範及權力網絡是我們據此取得認同的管道，它具有偶然性但卻是社會生活的必然狀態，當我們在爭取合法性的時候，這些規約是我們所不得不去面對干預的（Butler 2000）。巴特勒在此呼應了傅柯關於主

34 佛洛伊德區分哀悼（mourning）與憂鬱（melancholia）。佛洛伊德認為前者所指的是因為喪失所愛的人或事所產生的反應及症狀，哀悼迫使自我（ego）藉由認知到這些對象的死亡或消失，放棄其所眷戀的對象並得以繼續生存。相對的，佛洛伊德認為憂鬱的病人會在失去其所愛戀的對象時否定自身，並拒絕與外界接觸，其中的關鍵在於自我和所失去的對象之間的認同（identification of the ego with the abandoned object），於是對象的喪失（object-loss）竟被轉化自我的喪失（ego-loss），請參閱（Freud 1991）。

體形構與權力關係的不可分割的探討。

在主體形成的雙重制約之下，巴特勒所談的諧擬展演 (parodic performance) 政治便是藉由在重複過程中重新建造規約形貌 (re-configuration) 及援用 (redeployment) 規約的可能所啓動。諧擬展演是一個揭發現有存在可能性條件的偶然本質的機制，其目的在於「尋找每個意義指涉建構、規訓化、去規訓化身分認同過程中的政治成分」(Butler 1993: 3)。而此一過程也同時是在尋找藉由一種「細緻的、政治的展演性 (performativity)」顛覆主流霸權規約被重複實踐的一種策略思考。更具體的說，巴特勒認為性別是一種行爲 (act)，而這種行爲是可能被分裂 (splitting)、自我諧擬 (self-parody) 以及自我批判。這些對被大家視為理所當然的、視為極其自然的行爲，藉由言過其實地誇張展現 (hyperbolic exhibitions) 便蘊含曝露這些行爲的社會建構本質，及其建構邊緣的暴力與排擠機制 (1990: 146-47)。換句話說，藉由諧擬展演以及言過其實的展現方式，認同的過程可以同時具有去認同 (dis-identification) 的潛力。而這種諧擬展演、認同／去認同的實踐可以進一步與傅柯的權力／抵抗，自我修養及自我創造接合。

一如尼采在《善惡彼岸》中提示的哲學家是明日及後日之人，也就是哲學家所抱持的信念與實踐是與「當下」矛盾悖反的 (Nietzsche 1966: 137)，傅柯提倡一種「好奇」的精神，即對傳統價值階序的鄙視，對它者及陌生事物充滿好奇；不斷揚棄既定生活方式，並試著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及感受環繞在我們週遭的人事物 (2000b: 325)。這種好奇態度的培養同時也是一種康諾里 (William E. Connolly) 所稱的後尼采式倫理感性經驗 (Connolly 1998: 114)。藉由系譜式的挖掘，呈現主流的對他者／邪惡的定義人爲及非必然的特質，並挑戰原有的道德秩序，從而開發出一種不斷地面對衝突以及偶然性的批判態度。我們可以說巴特勒所標舉的諧擬模仿正是這樣一種態度的具體實踐。³⁵

35 例如扮裝皇后 (drag queen) 在其「模仿」的過程中，其實不只是消極被動地再現「女性特質」，而是藉由或「言過其實」(hyperbolic) 或「假」以亂「真」的性別展演，突顯「性別」作為一種社會規約性的實踐所仰賴的規訓界限。這個模仿的過程便是「諧擬」。然而後文中將說明「諧擬」本身並不必然造成顛覆的效果。

然而，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這樣一種說法必須和那種假設一個超驗的、可以隨著自由意志行為展演的主體區分開來 (ibid.: 145)。此外，我們也不可錯誤地以為所有的諧擬展演行為都會是一種政治干預。一如巴特勒所言，在每個意義指涉過程中尋找並定位政治的能力，是必須建立在一組新的問題意識的提出，並藉以擴充所謂「政治」的定義及範疇。一個呼之欲出的問題便是這一組新的問題是什麼？其實不論是布朗、巴特勒及其他受到傅柯影響的政治或社會理論，常會被視為無政府主義、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我們因此要問的是，傅柯的系譜式思考能夠提供何種新型態的政治想像，或者新的政治干預方式。有三個面向是不可不談的：反抗、接合 (articulation) 與霸權 (hegemony)。

三、權力／反抗與霸權形構

布朗對傅柯理論被視為非政治性或政治惰性 (political inertia) 的反駁，集中在她對系譜式政治不設定任何一個特定主體位置的解放潛能之認同。順著這個思考脈絡，布朗認為系譜式政治並不作任何「政治限定」 (political entailments)，相反的，它所提供的是一種特定的政治思考及政治判斷的論述空間 (discursive space) (1998: 46-47)。換言之，所謂的政治干預，指的便是建立一個排除所有「非如此不可」的論述異質空間 (heterogeneous space)。呼應傅柯所稱的「不論一個系統如何駭人，我們總是可以找到一些抵抗，不服從，及建立反對陣營的可能性」 (Foucault 1984c: 245)，布朗對於這樣一個異質空間的建立，以及權力與抵抗之間的互生互動關係抱持著十分樂觀的態度。對布朗而言，她對權利論述的批評重點並不在於去全盤否定權利論述在解放政治上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及功能；更關鍵的是我們必須持續不斷地質疑權利論述在某一個特定時空脈絡歷史節點的形構過程，並進一步深究其與整個論述場域之間的關聯，評估政治干預時權利論述的侷限與可能引發的進退兩難困境 (Brown 1995: 121)。

話雖如此，關於傅柯常被引用的「有權力之處皆有抵抗」是否只是一種一廂情願似的宣稱，以及為何某些特定的抵抗及干預可以被視為「政治的」，或是否所有的抵抗及干預都一定是「政治性的」等問題布朗都缺乏細緻的處

理。在此，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應該是何謂政治？布朗認為，

即使系譜學與某一特定政治動機不可劃分；即使它的用意在將『歷史定律』用彰顯暴露權力機制及關係的方式取而代之；即使它是以「當下」的去自然化之名，並藉此顯現其可塑性，系譜學既沒有提示任何特定的政治位置，也沒有特指任何可欲的將來。反之，系譜學旨在呈現為什麼我們會抱持某些特定的位置及關於未來的願景，尤其是揭示它們會在何時何處展開批判 (ibid.: 40)。

在此，我們看見布朗對於「暴露」、「揭發」、「顯示」權力關係及穿透論述的各式力量路徑 (lines of force) 的強調，然而關於所謂「暴露」、「揭發」、「顯示」等批判的出發點即所謂的「某一特定政治動機」，或德悉達所稱的「解構的切入點」(incision of deconstruction) (Derrida 1981) 並不見布朗多所著墨。即使巴特勒的諧擬觀點提供了我們關於主體解放的理論契機，但其論證缺乏對「政治」的系統性論述的情況下，常會招致其理論過份唯意志論 (voluntarism) 的批評。

讓我們來回顧傅柯的「有權力之處皆有抵抗」。這一句話其實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解讀的方式，而這兩種不同的解讀方式又將有相當不同的政治意涵。首先我們可以說傅柯並沒有明顯的擁抱抵抗政治，因為如果對傅柯而言抵抗跟權力關係一樣無所不在，我們在想像抵抗時甚至不須談及「政治」。另一種可能的閱讀便是將這句話倒過來讀。亦即權力關係只有在斷裂及抵抗中才會被顯現出來。用傅柯自己的話來說：如果我們理解我們當前的政治技術以及權力關係，我們必須以「各種抵抗不同權力關係的形式」為起點。亦即「以抵抗作為一種化學催化劑，使權力關係曝光，找出權力關係的所在，發掘權力關係的運用及方式」，也就是我們應從策略衝突 (antagonism of strategies)，而非從權力的「內在合理性」(internal rationality) 來分析權力 (Foucault 1982: 211)。權力與抵抗於是便形成了一種互為彼此可能性條件的關係：只有當主體是自由的時候，權力關係才有可能，亦即，在權力關係中如果不存在著抵抗 (傅柯認為在最極端的權力運作下，至少有自殺、跳樓、

或殺人等選項)的可能性，權力關係也就不復存在(2000a: 292)。³⁶

巴特勒的諧擬展演理論也必須被放在「權力——抵抗」的第二個讀法中理解。巴特勒自己也曾經說過：抵抗只有在力爭象徵規範系統的合法性及可理解性(the very terms of symbolic legitimacy and intelligibility)的重新建構中被看見(Butler, 1990: 3)。而她這個聲明對政治分析的重要性不容小覷。她所強調的是藉由對於主流霸權的解構及去自然化，揭露現成主流社會實踐基礎的偶然性(比方說是某種特定的性別實踐規範而不是另外一種)，並得以擴充我們對政治的看法。但巴特勒並未能因此排除那些認為她唯意志論的批評。她所欠缺的是將介入、干預以及暴露偶然性，與「接合」或「霸權化」等概念做更緊密的結合。事實上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更充分地掌握所謂「政治化」(politicization)的意涵。傅柯其實是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在政治實踐中以一個新的真理論述取代舊有真理論述的必要性：

比方說，我們可以在因不合理的政治情境所導致的宰制狀態之基礎上提出批評，但是，我們只能藉由參與某種真理遊戲，展現其結果，指出尚有其他合理的選項，教導人們哪些他們自己的處境、工作條件、所受的剝削，是他們自己尚未察覺的(Foucault 2000a: 296)。

從當代重要的霸權理論家拉克勞及慕芙的角度來看，一個新的真理秩序(truth regime)的建立，也就是霸權化的過程。承襲自列寧至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概念並修正了後者的經濟決定論，拉克勞與慕芙認為：

36 在談論傅柯的權力觀點時，常有論者以為傅柯並不處理宰制的問題，事實上傅柯並未昧於宰制的存在，他認為像十八、十九世紀的家庭結構中，我們並不能說男人完全地宰制女人，因為事實上當時的女人仍有一些抵抗的空間，包括：欺騙她們的丈夫，偷偷地攢錢，拒絕行房等，但傅柯也指出，這種抵抗只是一直停留在策略性的層次，從來沒有造成結構性權力關係的翻轉。在這種情況下，問題的關鍵便在於如何找出抵抗的發展的可能性。很多論者以為傅柯只著重在微觀層次的抵抗可能，而無意去為大規模的政治反抗提出具體建言，事實上傅柯並未排除諸如以政黨、工會、或大罷工等形式的抵抗。對傅柯而言，更重要的是對於特定權力關係，特定形式的宰制的具體系譜分析(Foucault 2000a: 293-294)。

一個藉由設立節點 (nodal points) 以及建構漸次性關係性認同 (relational identities) 所形成的相對統一的社會或政治空間，便是 Gramsci 所稱的「歷史集團」(historical bloc)。結合歷史集團的不同元素 (elements) 的連結——不是一個具有歷史先天性的整體 (unity)，而是一種規則性中的散亂 (regularity in dispersion) ——與我們關於論述形構的概念吻合。如果我們從歷史集團形成的敵意領域 (antagonistic terrain) 的角度來看，歷史集團就是我們所說的「霸權形構」(Laclau & Mouffe 1985: 136)。

一個抵抗的政治道德知識上的合法性及可被理解性，端賴霸權論述的建構及成立。此一霸權論述的建構，提供了一個「銘刻的表面」(surface of inscription)，即藉由某種特定的接合原則，將原本沒有特定意義的「元素」(element) 轉化為論述的構成要素 (moment)。亦即藉此吸納不同訴求及態度而將論述擴張成為主流的社會意向及行動。認同便是分殊主體位置的霸權化，而非某種超驗的本質的體現。在此必須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接合都會成為霸權接合，但一旦成為霸權接合便勢必會涉及力量的角逐，並將不一樣的認同標示成為必須予以消滅的敵人，而造成社會衝突，這便是所謂的「政治化」過程 (ibid 1985; Laclau 1990)。換言之，所謂的「政治化」所指涉的不只是去質疑現存的社會實踐，它同時也必須是將社會關係中的「從屬」(subordination) 問題以一種新的觀點，亦即「壓迫」(oppression) 來理解。「政治化」並不只是去呈現社會中的分類（不論是在性別、族群、性傾向等軸線上所做的分類）的偶然性，更必須指出它所隱含的階序化 (hierarchization) 以及原始暴力 (Bauman, 1991: 1)。³⁷ 如果我們過分渲染諧擬展演的政治意義，甚至不加區別地將之與政治干預或抵抗劃上等號，我們將更有可能面臨一種非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困境。一如前述，巴特勒已意識到在暴露

37 寶曼 (Zygmund Bauman) 指出，「分類就是分隔、隔離。也就是假定這世界是由具體不同的實體所構成……這些實體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並與某些實體相對抗……分類也就是給與世界一個架構」。

權力關係行使的曖昧和「政治地」實踐與諧擬展演行為之間存在著一個鴻溝。而這個鴻溝必須藉由清楚地意識到確實採取一個政治立場並據此結盟所必然要冒的風險。光是「拒絕」宰制關係本身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提供一個新方案。而傅柯即使在其晚期的著作中強調自我修養，反抗體制收編的重要性，卻也意識到提出替代方案，亦即反對論述形成之必要（Foucault 2000a: 293-294），從拉克勞及慕芙的論述理論角度來看，批判總已無可避免地涉及接合及霸權化的過程，而民主的動力便是在這種持續霸權化及去霸權化的抗爭過程中產生。

肆、結論

傅柯關於西方現代性的討論，及關於權力及主體形構的的探討，提供了一個理解國家及政治主體的新的視角。我們從主體形構過程中既從屬又但同時具有能動性的雙重特質，了解權力不是僅止於壓迫，而同時也具有生產性。國家作為細密的權力關係網絡的具體展現和政治主體之間的關聯便益形錯綜複雜。晚近關於所謂市民社會抵抗國家的說法，從傅柯的角度看來便是一個錯誤的命題，因為市民社會也完全地被權力關係穿透，換言之，從現代權力關係運作上的觀點出發，我們很難在概念上去區分市民社會及國家。值得注意的是系譜式政治的出發點並不在於預設一種二元對立的本質主義式的政治抗爭——比方說把市民社會或國家視為兩個完整相互對抗的整體——也不把政治主體化約為法律或權利主體，而是透過對現代主體形構過程及其多重面向的分析，開展一種永無止盡的批判態度及對現實的不斷逾越與持續反抗。因著權力關係的無所不在，公民作為一種政治主體的想像乃必須植基於對於權力關係的多元及滲透性的掌握。不論是自我內在的不斷突破更新，或集體地對抗權力關係，公民的權利與身分因此可以被理解為特定脈絡下權力關係與主體互動的型態樣貌，而關於公民的權利論述及身分建構的轉變往往是既有主體形構機制的變動、瓦解及重建。

相對於視其為消極無政府主義或虛無主義者的批評，傅柯的系譜式政治思考為我們提供了持續不斷干預解構既有的二元對立邏輯，不斷開發自我與

事物的偶然性，及檢視建構在既存權力關係的一個新的倫理基礎（Connolly 1998: 124）。然而前已述及，系譜式政治思考由於缺乏一個反抗的超驗基礎，「接合」亦即意義系統的建構及成為新的共識便成了不可或缺的政治過程，此即為拉克勞及慕芙的霸權政治觀點。不論是扮裝諧擬展演或自我的持續修養，所謂的顛覆或自由的取得都不是透過「私語言」進行的。行動本身顛覆性的界定與判斷都無可避免地牽動我們對於既存論述的「認知」與「敵對化」，而此一「敵對化的認知」也就是拉克勞及慕芙所謂的「政治」（the political）。忽略了這個環節，所謂的系譜式的斷裂、干預及突破現狀便不可想像。³⁸

參考資料

中文

林志明

1998 〈譯者導言讀：傅柯 Double〉，《古典時代瘋狂史》。台北：時報文化。

林淑芬

2003 〈政治行動的可能性條件〉，《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四期。

海德格

1994 〈尼采的話「上帝死了」〉，《林中路》，孫周興（譯）。台北：時報出版社。

傅柯

1999 《必須保衛社會》，錢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文

Allison, Henry

1983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rendt, Hanna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9 "On Hannah Arendt" in Melvyn Hill, (ed.), *The Recovery of the Public 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38 關於拉克勞與慕芙的霸權理論，筆者已另文討論，請參見（林淑芬: 2003）。

- Bauman, Zygmunt
1991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Oxford: Polity Press.
- Benjamin, Walter
1969 *Illuminations*. Hannah Arendt (ed.), Harry Zohn (trans.), New York: Schocken.
- Blumenberg, Hans
1983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rown, Wendy
1995 *States of Injury: Power and Freedom in Late Modern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Genealogical Politics", in Jeremy Moss (ed.), *The Later Foucault*. London: Sage.
-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London: Routledge.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London: Routledge.
1997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ompeting Universalities", in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Žiž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ies: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n the Left*. London: Verso.
- Connolly, W. E.
1988 "Nietzsche: Politics and Homesickness",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8 "Ethical Sensibility of Michel Foucault", in Moss (ed.), *The Later Foucaul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Derrida, Jacques
1978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Positions: Interview with Jean-Louis Houdebine and Guy Scarpetta", in *Posi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ntreves, A. P.
1951 *Natural Law: 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Philosophy*.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 Dreyfus Hubert L. & Paul Rabinow
1982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 Ehrenreich, Barbara and Frances Fox Piven
1983 "Women and Welfare States", in *Alternatives: Proposals for America from the Democratic Left*. Irving Howe (ed.), New York: Pantheon.
- Eisenstein, Zillah R.
1993 *The Radical Future of Liberal Feminism*, with a new preface and postscript,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Evans, Judith

- 1995 *Feminist Theory Today: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Wave Feminism*. London: Sage.

Foucault, Michel

- 1980a "Body/Power", in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C. Gordon (ed.),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 1980b "Two Lectures", in *Power/Knowledge*.
- 1980c "Truth and Power", in *Power/Knowledge*.
- 1982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Hubert L. Dreyfus &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 1984a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Foucault's Though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1984b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 1984c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interview by Paul Rabinow, in *The Foucault Reader*.
- 1988 "Practicing Criticism", in Kritzman (ed.),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1989a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 M. Sheridan (trans.), London: Routledge.
- 1989b "Friendship as a Way of Life", in Sylvere Lotringer (ed.), *Foucault Live*. New York: Semiotext(e).
- 199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Robert Hurley (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1991a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lan Sheridan (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1991b "Governmentality" in *The Foucault Effect*,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eds.),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 1991c "Politics and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The Foucault Effect*.
- 1991d "Questions on Method", in *The Foucault Effect*.
- 1992 *The Use of Pleasure,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2, Robert Hurley (tran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1994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2000a "The Ethics of the Concern for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 in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4, volume 1,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2000b "The Masked Philosopher" in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4, volume 1,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 2000c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in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4, volume 1,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Fraser, Nancy

- 1989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reud, Sigmund
1991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in *On Metapsychology: The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Gordon, Colin
1991 "Governmental rationality: An introduction", in *The Foucault Effect*.
- Habermas, Jürgen
1981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 in *New German Critique* 22 Winter: 3-14.
- Heidegger, Martin
1999 *Ontology—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 John van Buren (trans.),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owarth, David
2000 *Discourse*. Cambrid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 Kelly, Michael, (ed.)
1994 *Critique and Power: Recasting the Foucault/Habermas Debat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Kólakowski, Leszek
1982 *Religion*. London: Fontana.
- Kundera, Milan
1984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Michael Henry Heim (tr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1985 *Hegemony &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 Laclau, Ernesto
1990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 Liotard, Jean-Franc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trans.) and forwarded by Fredric Jameson,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arx, Karl
1978 "On the Jewish Question", *The Marx-Engels Reader*. R.C. Tucker (ed.), New York: Norton.
- Nietzsche, Friedrich
1966 *Beyond Good and Evil: Prelude to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Walter Kaufman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1969 *The Will to Power*. Walter Kaufmann and R.J. Hollingdale (trans.), edited with commentary by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The Gay Science: With a Prelude in Rhymes and an Appendix of Songs*. Walter Kaufman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Staten, Henry

1984 *Wittgenstein and Derrid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Tong, Rosemary Putnam

1998 *Feminist Thought: A More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Villa, Dana

1998 *Politics, Philosophy, Terror: Essays on the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isker, Rudi

1995 *Michel Foucault: Genealogy as Critique*. London: Verso.

Michel Foucault on Power and Subject

Shu-fen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essay attempts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reading of “citizen” and “state”. It draws on Foucault’s interrogation/de-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cendental subject”, knowledge/power/subject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his analysis of the disciplinary and regulatory power networks. Based on this, the essay displaces classical discussions of “state” with “power relations”; “citizen” with “subject”. In so doing, the essay clarifies the meaning of “genealogical politics” and brings into light the latter’s radical potentials when reflecting o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onditions. Finally, the essay reflects on the tendency of ‘de-politicization’ in genealogical politics, and suggests “reactivating” politics with categories such as “articulation” and “hegemony”.

Key Words: subject, power, modernity, resistance, the political